

青铜尊里的中国故事

尊是人们熟悉的中国传统青铜器，代表着泱泱中华数千年文明脉络。“中国”二字最早就见于青铜尊铭文，而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的造型，也参考了青铜尊中的“无肩尊”。

尊为何能成为重要礼器？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？

尊本是青铜礼器通称

其实，青铜器中的“尊”与“彝”类似，本来是酒器、食器等各种礼器的通名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尊彝》中说有献尊、象尊、著尊、壶尊、大尊、山尊这“六尊”。献尊大概就是今天所见体形像犀或牛的尊，象尊是体形像大象的尊，著尊是着地无足之尊，壶尊是以壶为尊，大尊是古代的陶尊，山尊是器上刻画有山云之形的尊。其中献、象尊在春祠祭、夏禴(yù è)祭使用，著、壶尊在秋尝祭、冬烝祭使用，大、山尊则在四季之间的追享祭、朝享祭使用。

不过，“尊”在甲骨文、金文均是从“酉”从“升”，像是双手捧酒尊之形。故从北宋《考古图》《博古图录》开始，把“尊”限制为酒器名称，但当时区分也不太严格。直到1941年容庚先生作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才把觚、觯、壶、罍等一类酒器排除在外，使尊成为单一器类名称。

这种尊的共同特征是：大口，腹部粗而鼓胀，高圈足，形体较宽。以器身是否有肩部，被分为“有肩尊”和“无肩尊”。有肩尊既有圆尊，也有方尊，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有肩尊；无肩尊一般是圆尊，比如著名的何尊就是无肩尊。

不过，除了这类专有名称的尊外，仍有一类盛酒器被统称“尊”，这就是形似鸟兽的“鸟兽形尊”。鸟兽形尊主要有鶡、禽、虎、象、犀、牛、羊、马、兔、神兽等十种，比如著名的妇好鸮尊，外形就是一只猫头鹰的形状。

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尊于1955年在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，属于二里岗早商文化。这一时期的青铜尊数量不多，纹饰也比较简单，个别出现兽首装饰，无铭文。

因为商代重酒之风的盛行，所以青铜尊在商代晚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。这一时期不但出土的青铜尊多，而且出土范围也非常广，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之外，南方地



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火种台



何尊

区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、湖南宁乡炭河遗址等都发现了青铜尊。方尊也在此时出现，也开始有了少量铭文。

西周前期仍然延续了商文化，而且出现了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尊，比如何尊就有119字（一说122字）之多。但西周中期开始，因为周人禁酒的影响，食器、水器比酒器受到更多重视。青铜尊不但数量大为减少，而且装饰也趋向简化。春秋时期，青铜尊在北方基本已经消失。

目前所见最晚的青铜尊，是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滇人墓葬出土的双牛尊。此后，青铜尊作为一种文化遗存，消亡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
青铜尊铭文里的故事

青铜尊铭文有一些有趣的史料，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，这里主要介绍何尊与碉(dí ào)生尊。

大臣何听了这番话，认为大王有恭顺的德行，能够顺应上天，教育了迟钝的自己。成王告诫后，还赏赐给何三十朋。当时流行贝币，一朋就是十贝。何用它来制作了这件宝尊，时间是在周成王五年。所以，这件铜尊被称为“何尊”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何尊第一次使用了“中国”这个词。尽管当时的“中国”更多是地理概念，但也奠定了后世“中国”国家概念的基础。

碉生尊于2006年11月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，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。当时发现了一座青铜器窖藏，其中有两件青铜无肩尊，其形制、纹饰、大小、铭文基本相同，通高31厘米、口径31.8厘米、底径13.6厘米，有铭文113字，被称为“五年碉生尊”。有趣的是，它与过去发现的“五年碉生簋”“六年碉生簋”有关联。

五年碉生簋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。碉生是周厉王时人，祖先是周初功臣召公奭，当时召氏族长是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，碉生是召伯虎的堂弟，属于召氏小宗。厉王五年正月己丑日，碉生祭祀父亲宫仲，召伯虎前来参加。召伯虎夫人传达了召伯虎、碉生祖母君氏的忧虑。原来召氏疏于对附庸土地管理，产权归属不定，经常导致诉讼。君氏要求碉生跟随召伯虎去诉讼，分割方案则是由碉生占五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分成。

六年碉生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说的是六年四月甲子日，召伯虎和碉生对于附庸土地的诉讼工作已经结束。可见，六年碉生簋与五年碉生簋是有关系的。

那么，召氏最终采取了哪种方案呢？五年碉生尊破解了谜团。原来在五年九月初吉日，召伯虎夫人召姜就去见过碉生，召姜提出确定按五分之二的方案，这显然对碉生更加有利的。另外一件青铜器还表明，碉生在厉王十一年时还担任过周王室的“宰”。

《诗经·小雅》有一篇《棠棣》，讲的是周人宴会兄弟时，歌颂兄弟感情，其中有一句名言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”。而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召伯虎。“碉生三器”的发现，正好可以为这首诗作上一个完美的脚注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神童岂可“人造”

所谓神童，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。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，比较知名的有：王禹偁6岁、孔文仲7岁、蒋堂6岁、黄庭坚7岁会作诗。王曾从小“善为文辞”；苏轼10岁“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”；叶梦得“嗜学早成”；张孝祥自幼“读书过目不忘，下笔顷刻数千言”；陈傅良儿时为文章，自成一家，等等。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“未尝识书具”，但能“指物作诗立就，其文理皆有可观者”。更有甚者，神童杨亿“数岁不能言”，却突然吟咏出《登楼》诗：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

为此，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，又叫童子举，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，称为神童。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紘、晏殊、姜益、李淑、蔡伯希等，先后中童子科，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。

宋代实行童子举后，先后有三百多个神童被推荐参加了童子试，但是中试的很少，不完全统计才三十多人。

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，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宋神宗元丰时，在京小学有“就傅”“初盆”两斋。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，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，小学生近千人，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。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，率以诵经书字多少，差次补内舍、上舍。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小学规约办学，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。

因为京城开封的办学条件好，有的家长为了使子弟能够进入好学校学习，不惜拉关系寻门径，甚至采取冒充县户等手段进入在京小学。也有些富裕人家，不惜以重金聘请家庭教师“次教之五经”，以达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。

但如此人工造神，神童质量必定严重下降。对此，宋高宗很清醒：“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，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，故求试者云集，此虽善事，然可以知人主好恶，不可不审也……朕即位以来，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，未闻有登科显名者。”所以，对于这些神童，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，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，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。对于童子试的改革，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、考试内容着手。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，须赋诗、会诵读、理解御制诗文，以考查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。

神童被筛选出来了，但是离国家有用之才还差得远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慢慢地销声匿迹了。

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。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，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“甚为奇之”，并纷纷送钱资助，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“网红”神童。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，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，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，以获取钱财，不再让他学习。于是渐渐“不称前时之闻”，而终成“泯然众人”，最终沦落乡野，无人问津。

对此，王安石感慨道：“仲永之通悟，受之天也，其受之天也，贤于材人远矣。卒为众人，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。”神童再聪明，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，也难成大材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